

## 运城珍宝馆



□记者 薛丽娟

墓志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承载着无数先人的故事与情感。它以寥寥文字为墨,于方寸石刻之间勾勒出资者生平的轮廓,在简短的篇幅里道尽一生的浮沉起落,宛如一部浓缩的人生史诗。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的特殊文体,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逐渐成熟,到唐代达到了鼎盛阶段。通常,墓志铭由志和铭两部分构成。志文以散文的形式,详细记叙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族背景及生平事迹,像一部个人的历史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铭文则多采用韵文,以简洁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逝者的品德功业,寄托着后人的哀思与赞誉之情。二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叙事+评价”的经典二元结构。

作为石刻文献,墓志铭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个人生命历程的记录,更在宏观层面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内容常常能够补充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缺漏,为研究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可以说是探究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依据。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墓志铭的形制、书体演变等,

李山墓志铭  
石刻上的唐代人生画卷

可作为考古断代的重要参考。例如,唐代墓志铭的书法艺术即反映了当时的审美风尚和文化特色。

在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着一通唐代碑刻——“李山墓志铭”。这方墓志铭不仅是唐代丧葬文化的实物见证,更是窥探当时人们价值取向与生死哲思的窗口。

“李山墓志铭”为一合墓志,其盖文别具一格。古朴典雅的篆书字体,3行文字,每行3字,工整地镌刻着“大周故李君墓志之铭”。此处“大周”指的是唐时武则天建立的朝代。墓志的志文部分,则以楷书呈现,共20行,满行21字,记载着李山的生平事略。

从志文中我们了解到,李山,字山,原是京兆陇西人,后因家族随任迁徙至河东,成了蒲州安邑人。他的家族渊源深厚,或许是帝乙后裔的分支。其祖父曾任折冲府,英略非凡,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表现;父亲为大唐鄆州录事参军,品格高洁,凭借出众的文才辅佐职司,深受乡里的赞誉。

在这样的家族熏陶下,李山本人贤良兼具,忠孝双全,才识出众,被时人推为“人物称其第一”。他的夫人张氏、陈氏,品性如兰,德行兼备,不慕荣华富贵,以四德为生平修养,展现出唐代女性的美好品德。

然而,人生无常,尽管人们渴望世事稳固,却终究难以抵挡生死的离别。大周天授元年,李山与夫人合葬于安邑夏乡之界。墓志铭中以深沉的笔调感叹着人生的短暂与无常,表达了对逝者的深切怀念。

最后的铭文部分,以优美的韵文赞颂了李山家族人才辈出,德行如玉,

## 文物名片

主角:李山墓志铭  
出生时间:唐代  
尺寸:高37.5厘米、宽36.5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福泽绵延,仁爱盛德。同时,也感慨时光的无情,哲人已逝,只留下孤坟寒树。于是刻石留念,希望李山的精神如同“贞石无穷”一般,永远被铭记。

整篇墓志铭通过叙事与韵文结合,既梳理家族脉络、人物功绩,又寄寓对逝者的悼念,展现了唐代墓志铭“志”“铭”结合的文体特征。

透过“李山墓志铭”的文字,仿佛看到了李山的一生在眼前徐徐展开。他生活在繁荣而多元的唐代,家族的荣耀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他自身的才华和品德也使他在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方墓志铭不仅是对李山个人生平的记录,更是唐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当时的家族观念、社会风尚以及人们对生死的思考。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概括:“志者,记也;铭者,名也。”这种独特的文体形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盖棺定论”的生死观,又展现了古代文人“以文传史”的自觉意识。“李山墓志铭”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它是生与死的对话,是后人对先辈的追思与铭记,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



□记者 王捷

河东大地文物古迹众多,如果您留意,可能就会在某个佛寺古刹与韦陀菩萨塑像偶遇。韦陀(韦驮)菩萨是佛教中的护法神,肩负护持佛法、庇佑僧众与寺庙等重要使命。在盐湖区博物馆,就有这样一件明代鎏金韦陀立像,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金属技艺、审美意趣等历史文化内涵,颇引人注目。

据《大藏经》记载,韦陀生于农历六月初三,自诞生起便立下护持佛法的宏愿,凭借强大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念,成为佛门寺院不可或缺的法象征,佛教中尊称其为“韦陀菩萨”,其所持的武器名为金刚降魔杵,象征着无坚不摧的力量。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寺庙中韦陀菩萨的形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常被塑造成英俊威武的武将形象,身披铠甲、手持金刚杵,寓意着守护佛法与寺院。

明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很多人都信奉佛教,这使得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加之明代工艺技艺十分发达,鎏金工艺已相当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鎏金韦陀塑像便应运而生。

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这件明代鎏金韦陀立像就很好地展现了佛教文化本土化的特点。其通高37厘米、座高9厘米,韦陀面目威武、眼神坚定,仿佛时刻警惕着一切,守护着佛法的安宁。其通体鎏金,经过岁月洗礼,虽然鎏金剥落,但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鎏金,又称火法镀金、飞金、黄涂、金涂等,是一种铜器装饰工艺,在金属表面加上金层。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需要经过抹金、烘烤、开金、压光等多道工序,这也使得这尊韦陀立像更加添璀璨光辉、庄重威严。韦陀头戴盔、身披甲、腰束革带,身披倒“U”字形帔帛,其雕工精致入微,每一处都雕刻得栩栩如生,纹理清晰可见,彰显了明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韦陀的姿态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佛教中,韦陀手中金刚杵的摆放位置有着特殊的含义。这件立像为立姿,双手合掌,手中的金刚杵应系平端横放在胸前,表示其所在的寺庙为中等规模,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吃住一天。此外,还有两种情况:韦陀双手放下肚脐附近,金刚杵竖立在地上,表明是小寺庙无力招待;韦驮一只手向上弯曲,一只手将金刚杵扛在肩上,盖过头顶,则表明寺庙规模很大,可以招待云游和尚吃住三天。小小的姿态,反映出当时寺庙的规模与接待能力,也让人们看到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细致体现。

这件明代鎏金韦陀立像,穿越600多年时空,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让我们领略到古人的信仰、智慧与技艺。它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研究明代历史、宗教、工艺、社会风貌等的重要实物资料,是中华文明的一段璀璨记忆。

## 文物名片

主角:鎏金韦陀立像  
出生时间:明代  
尺寸:通高37厘米、座高9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 几何纹三眼陶灶

## 再现千年前的烟火生活

从灶形上看,有长方形、方形、圆形、马蹄形、拱形等;从胎质和釉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绿釉陶、黄釉陶、绛釉陶、覆彩陶等;灶门有方孔、拱形孔之分,有落地或不落地的区别;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甚至多眼。灶面装饰内容也非常丰富,通常模印有鸡、鸭、鱼、肉等各类食物及碗、盘、刀、铲、勺、瓢等炊具、餐具;灶壁上还刻有几何纹、水波纹、龙虎怪兽等,造型生动写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盐湖区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多件各式汉代陶灶,其中有一件西汉几何纹三眼陶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件陶灶整体呈马蹄形,前设方形灶门,上作额墙,下有地台,灶面上三个火眼前后呈“品”字形排列,上置罐、釜等灶具,做工精细,纹饰清晰。灶四周装饰凸起的几何纹为模印而成,在3个火眼周围还模印有鱼、勺、刀等物品,这些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古人在灶台边操作,要把这鱼做成怎样的美味?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陶灶灶台上三眼的设计也体现了古人的节能智慧。据了解,单个火眼的灶台在蒸煮食物时能集中火力,但热量流失较多,而多火眼可以在一个大火眼蒸煮的同时,利用余热烹饪其他食物或者

进行烧水等。多个火眼的同时使用,能够实现火源的最大化利用,提高烹饪的效率,生动体现了古人的生活智慧。

“民以食为天”,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在我们看到的一件件文物中变得具象化。通过博物馆馆藏的各式陶器,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美食的追求不是简单的“能吃”,他们在煎、炸、烹、煮等厨艺上早已有了较高的水平。在欣赏这些陶灶的同时,我们窥视到了汉代先民使用灶的真实状况,也看到了数千年前他们对饮食的重视和文明程度,触摸到他们的生活脉络。每一次凝视,仿佛都能看到千年前的烟火气息,听到人们在灶台旁忙碌的声响,那是关于历史的回声。



□记者 杨颖琦

自从学会使用火之后,人类就逐渐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开始一步步走向文明,在人类向文明渐进的过程中,炉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工具。陶灶,就是那一时期祭祀和陪葬用的仿实物缩小制作的陶质炉灶。今天,让我们通过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几何纹三眼陶灶,穿越时空,探寻历史中的烟火气。

据专家介绍,两汉时期是我国有封闭燃烧室和固定烟道的炊具——灶的出现和定型阶段。西汉中期及以前的陶灶,形制相对比较简单,多是1个火眼;到了西汉后期,出现了多个火眼的灶台,通常由1个大火眼和1个或多个小火眼组成,也有3个大小相等的火眼。灶面上也开始出现模印食物和厨房用具,并在灶面四周刻划图案,使陶灶更具有装饰艺术性。

作为汉代以来墓葬中主要的陪葬明器之一,陶灶常与陶仓、陶井等成组出土。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各地出土的陶灶形制多样、形态各异。